

国产纪录片《零零后》上映在即,花12年跟拍两位主人公的成长,引发业内热议——

高速发展的纪录片市场,能否为小火慢炖的感动留出空间?



这场维持12年的成长记录,将两位主人公的成长蜕变展现在观众面前。图为《零零后》主人公池亦洋(左),柔柔(右)。(片方供图)

■本报记者 张祯希

12年跟拍,记录下两名中国00后从幼儿到青年的成长经历;300多小时的影像,最终剪辑成约90分钟的成片。

即将上映的国产纪录片《零零后》,时间投入与废片率都高得惊人。时间往往能激发出真实最质朴又最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场维持12年的成长记录,在绵延的时间之河中打捞起充盈的细节,编织出个体生命蜿蜒的成长曲线,也完成了一次对教育、成长的辩证思考。用该片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的话说,“这是用12年写给年轻父母的一封信家书。”

对中国纪录片爱好者来说,登上大银幕的《零零后》是亲切又陌生的——用持久的记录挖掘平凡个体的不平凡,曾是中国纪录片的鲜明特色。如今,这种质朴细腻的表达却不再常见。12年的拍摄,带来

内容的感动,也引发纪录片的产业之思:如同电影市场中“商业大片”与“作家电影”的分野一样,高速发展的中国纪录片市场也开启了类型分裂。当下,模式可复制、叙事有套路的工业化产品逐渐成为市场主流。那么,体现导演鲜明艺术风格、承载细腻人文关怀,由小火慢炖而成的“导演纪录片”又将如何寻回感动常在的生存空间?

中国00后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之一

在张同道看来,中国00后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之一。他们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与理念更为开放的父母。很多孩子七八岁就已周游世界,他们以落落大方的姿态与国际文化相处;可以说,他们是个性与视野都被充分开放的、充满文化自信的一代人。怀着

“他们长大后会是怎么样?”的好奇,一场记录之旅就启航,并且一发不可收,一拍就是12年。

12年的跟踪式记录中,有对教育如何作用于人的思考,也有个人成长的精彩弧光。男孩池亦洋是幼儿园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孰料升入小学后,却因难以适应教学环境,成了老师父母眼中的“问题孩子”。直到中学,池亦洋才在橄榄球中找到了奋斗目标,通过一番努力,他甚至代表中国橄榄球青年队出现在了国际赛场上;小女孩柔柔的成长,则折射出不少敏感女孩必经的心灵蜕变。这个幼时会将观赏风景说成“呼吸风景”的诗意女孩,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在十几岁便踏上留学之旅,但“全A”的高分,依旧难以填补独自自在外的寂寞感与文化认同落差。过早独立面对生活,带来了伤痛也揭开了成长的顿悟,这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小女孩逐渐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围

着你转的”。

张同道告诉记者,纪录片中的两位小主人公并非中国00后中的典型,他们的“成长烦恼”却带着这一代人鲜明的DNA烙印。在池亦洋身上就能看到一种对当下家庭教育反思,“很多孩子在家长的要求下学各种特长,并非出于自己的兴趣,很难激发真正的热爱。因个人兴趣选择橄榄球的池亦洋,却从中找寻到了人生的目标”。在张同道看来,两位00后,一个在兴趣中找到青春的昂扬斗志,一个在留学中体悟成长的阵痛,这正是00后一代丰富性的体现,也是“个性化教育到底能对个体产生多大影响”这一命题的直观呈现。

如何在工业化模式之外,拓展“导演纪录片”的平台?

在《零零后》的出品、发行名单上有

一长串名字。凭借在“圈内”常年拍摄、研究积累下的好人缘,以及作品题材本身的独特性优势,身兼导演、学者双重身份的张同道,为《零零后》争取了600万元的投资成本,这个数额在业界属于中等偏下。如今《零零后》即将进入大银幕,这似乎为此类用时间开掘生活的作品,开了个市场化的好头。但对于这类作品的前景,张同道并不乐观,他说:“目前中国纪录片生产机制并不能支持这类成本不可控的‘导演纪录片’,而是更多偏向于工业化纪录片”。

何为“工业化纪录片”?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系主任罗薇给出自己的定义:故事密度和节奏标准化,拍摄时间、成本可控制,紧贴市场审美需求。在她看来,当下中国纪录片的确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蓬勃发展;高度的工业化,激活了中国纪录片市场的商业潜能,让国产纪录片网红辈出,实现了从小众

到大众的华丽转身。然而,资本直奔收视率、票房与奖项而去,也导致了套路化、模式化的泛滥;以生命体验为核心,体现导演个人风格与人文关怀的纪录片面世、传播的机会变得更小。“国产纪录片要生存要发展壮大,必须走工业化、市场化道路。与此同时,真正成熟的市场,也离不开多样化的类型”。

如何在渐成主流的工业化模式之外,为“导演纪录片”留出空间?罗薇认为,除了引入更多社会资本的资金扶持外,观众渠道的拓展与精准投放也很重要。“偏向人文关怀的纪录片并不需要极大的市场,关键是要通过建立可持续的平台与机制,为其匹配、培养合拍的观众群体。当下,针对文艺片、纪录片爱好者的点映机构、各地的影视节展播都是有效的‘配对’渠道。纪录片进高校则是受众培养的有益尝试,高校学生具备读片能力,也是未来经济的主力。”

在可预见的未来,科技对人类能力的改变会更剧烈么?一批新近出版的科技图书试图作出回答

通往未来的路径:技术让人类更了解自己

■本报记者 柳青

科技越发展,就越深入地渗透进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当中国已经走在5G技术的前沿。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更多的普通人也迫切地需要了解“科技”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既然网络、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虚拟现实等等在不同层面改变了人类的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种种改变会来得更剧烈么?一批新近出版的科技图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

《5G时代》打开的未来想象

在高速、移动互联、万物相连的智能互联网大环境下,虚拟和现实将不再是割裂的,技术革新带来的是思维革命

在人们对4G已经司空见惯的当下,5G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数字的变化仅仅意味着更快的网速么?显然不是的。项立刚在新作《5G时代》里,跳出通信技术的框架,探讨并畅想在一个全新网络体系下,社会和经济生活会发生哪些颠覆式改变。

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的移动通信,每一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技水平。第一代解决通信移动化,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提供了通信能力。第二代让人类进入数字通信时代,通信的品质和安全度都提高了。第三代让人类进入数据通信时代,手机从打电话的工具转向智能化。第四代见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第五代除了高速之外,更大的作用是把通信能力延展到人与机器,成为智能互联网的基础。

这意味着,5G不仅是移动通信技术,更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一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将重新定义传统产业。传统互联网以PC为核心终端,主要用于信息传输,服务能力为辅。移动互联网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终端,主要为生活服务。智能互联网将把生活中的各种设备变成终端,不仅提供生活服务,甚至会参与到生产制造中去。比如,将手机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联接汽车形成车联网,汽车的远程控制已不是电影里的臆想,攻克无人驾驶的关卡,5G会给交通领域带来巨大变革。传统交通方式将被智能交通取代,未来的道路交通运输系统是智能化的数码道路,车辆智能化和自动化成为基本要求,因交通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将大幅度减少。

在高速、移动互联、万物相连的智能互联网大环境下,虚拟和现实将不再是割裂的,技术革新带来的是思维革命。随着5G的演进,人类终将突破信息传输的瓶颈,突破感官的限制,把外界的信息直接和人脑联系起来。可以设想,在人体中植入生物芯片,和人脑神经系统连接起来,大量信息不是通过文字、语音、图片的中转,而是直接发送到人脑中。科学家的梦想是让知

识、梦境、记忆自由地在脑细胞和芯片之间转移、复制、提取。“学习”将不再是漫长复杂的过程,而是信息的瞬间转移。

进入《生命3.0》阶段
我们极大地低估了生命的未来潜力,在科技帮助下,生命有潜力散播到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遥远边界

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教授在《生命3.0》中打破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物理学的学科界限,并且把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概念放置到广义的“宇宙”范畴中考量。他给“生命”下的定义是:一个能保持自身复杂性并能进行复制的过程,复制的对象不是由原子组成的物质,而是能阐明原子是如何排列的信息,这种信息由比特组成。换句话说,他认为生命是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它的信息软件既决定了它的行为,又决定了其硬件的蓝图。

在这个定义的前提下,他提出“生命1.0、2.0和3.0”的递进层级,即,生命是逐渐变得复杂和有趣的。4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生命1.0,这类生命体在它的有生之年都无法重新设计自己的硬件和软件,二者皆由它的DNA决定,只有进化带来改变,而进化需要很多世代发生。人类的硬件是通过生长获得的,人类的软件则是成长中通过学习获得的;今天人类所具备的行走、阅读、写作、计算、歌唱以及讲笑话的能力,都属于软件的改造和升级。设计软件的能力让生命2.0比生命1.0更聪明,也让它们更灵活。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生命1.0只能通过进化来缓慢适应,生命2.0却可以通过软件升级来迅速适应。人类DNA中存储的信息在过去5万年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人类文明的信息总量仿佛发生了大爆炸。

泰格马克教授认为,今天的人类应该算在生命2.1阶段;可以对自身硬件实施一些微小的升级,比如种植假牙、植入心脏起搏器,但没法做到“长高10倍”或“把脑容量扩充1000倍”这样戏剧化的事。他在书中畅想的生命3.0,目前尚不存在,那个阶段的生命体不仅能最大限度地重新设计自己的软件,还能重新设计自己的硬件,而不用等待许多世代的缓慢进化。1982年上映的电影《银翼杀手》里的“仿生人”,大致等同于“生命3.0”,虽然真实的2019年并没有像电影里描绘的那样,但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认为,生命3.0大概率会在一个世纪内降临,最早也许是2055年前后。

泰格马克提出,生命的数字化是宇宙进化所不能阻挡的进程,他很乐观地预估,技术赋予生命的力量会让生命实现空前兴盛。他写道:

“宇宙中生命的最终极限取决于物理定律,而非智能。我们极大地低估了生命的未来潜力,在科技帮助下,生命有潜力散播到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遥远边界。”

《为什么》你比你的数据更聪明
数据固然重要,但那些承载着知识和经验的“因果”模型,是帮助机器真正走向人工智能的关键

大部分围绕“技术变革”主题的科普书籍视角是前瞻的,展望或预判技术会带来的思维变革和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影响,而朱迪·珀尔教授在《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这本科普著作里,却仔细回顾、梳理了历史脉络,在哲学层面反思“科学从何而来,技术往何处去”。

珀尔教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1978年,他在加州大学创建认知系统实验室。30多年里,他从人工智能的前沿逐渐转向哲学和思想史的领域,研究人类认知论的历史。珀尔的学术信念是理解人类如何认知世界,或者说,他试图利用哲学传统厘清人工智能领域的盲区。他在《为什么》的序言里写道:“新一代机器人应该能够向我们解释事情为何发生,为何机器人以它们选择的某种方式做出反应,以及大自然为何以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方式运作。它们应该能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自身,我们的思维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运行,以及理性思考原因和结果、信任和遗憾、目的和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哲学的“因果论”能拓宽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呢?珀尔把因果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级研究“关联”,第二层级研究“干预”,第三层级研究“反事实推理”。他认为,当前的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处于最低的第一层级,被动地接受观测结果。处于第二层级的“干预”关乎主动实施某个行动。第三层级的“反事实”是想象的产物,典型问题是“假如我做了……会怎么样?为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人类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机器来说就没那么容易。《人类简史》的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发展出描绘虚构之物的能力正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认知革命,是真正的智能,因为人类在虚构中超越现实,在反思中成熟。在这个意义上,那么,因果论和它的工具——反事实推理——如果能被用于人工智能,将是令人激动的创新。

珀尔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人类的自我认知应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为强人工智能是人类大脑的延伸。“如果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你比你的数据更聪明,数据不了解因果,而人类了解。我希望因果推断这门科学让人类更好地理解自身,因为除了自我模拟,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了解自己。”



失火前的巴黎圣母院。 新华社发

《巴黎圣母院》为何没有消灭巴黎圣母院?

■本报记者 卫中

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表达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书籍将要消灭建筑”。不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看来,也恰恰是这部名著,最终证明了书籍和建筑之间可以相互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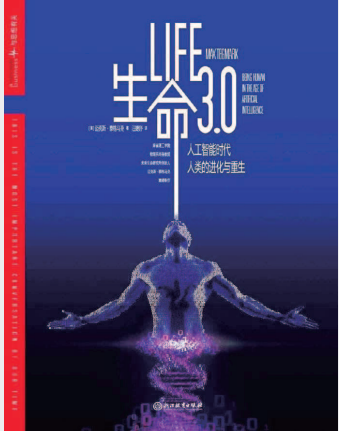
在上海图书馆日前举行的一场名为“《巴黎圣母院》与巴黎圣母院”的讲座中,余中先分析了雨果这一观点的由来:雨果认为,从人类的原始时期直到15世纪,建筑艺术是人类社会的“大书”,是人类发展各阶段表达力量和睿智的主要手段。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梁、柱、墙、板和屋顶等,人类把自己的思想融进这些“词汇”书写了建筑这本“大书”,因此建筑物承载着当时人类的文化和历史。但是随着印刷术和书籍的普及,承载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手段变成书籍了,雨果因此担心,“书籍将要消灭建筑”。他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印刷术的发明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每代人的思想不再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材料来写,哪怕是用石头写的十分坚固持久的著作,也将让位给用纸张印刷成的更加坚固更加持久的著作……它表示一种艺术将要推翻另一种艺术,它的意思是说:‘印刷术要消灭建筑艺术。’”最后,雨果得出结论:“自从发明了印刷术以后,建筑艺术就逐渐变得枯燥无味,日益衰老和剥落。”

在余中先看来,每一代文化人,都会担忧传统的艺术样式和媒介会被后来者取而代之。在雨果那个时代,人们担心书籍消灭建筑,现当代人则担心广播、电视、电影会消灭书籍,互联网会消灭阅读。但是事实上,《巴黎圣母院》并没有消灭巴黎圣母院这栋建筑,恰恰相反,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先有小说,再有建筑”,许多游客去法国参观巴黎圣母院时都会想到,自己是否需要看过小说才出发,或者参观回来后补上功课阅读这本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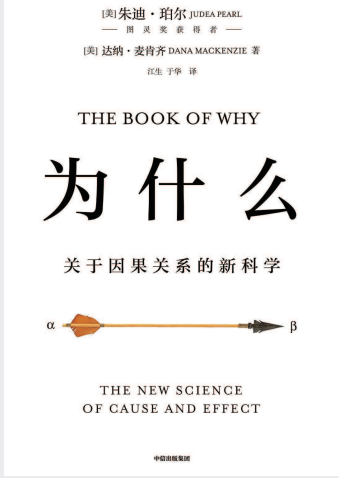
联系到今年4月震惊世界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余中先认为,即使巴黎圣母院有一天会倒塌,或者外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只要读者看到《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那么这栋古老建筑的样子就还在,“巴黎圣母院的魂就还在”。他因此得出结论:书籍与建筑之间并没有“一个消灭另一个”,反而发生了某种对调的关系,出现“一个养育另一个,一个促进另一个,一个繁荣另一个”这样的状况。



项立刚《5G时代》书影。



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书影。



朱迪·珀尔《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书影。(均出版方供图)